

“志士担当,乃有事功”

□ 王成娟

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沂蒙专署专员牟宜之有两句著名的诗:“无诗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树碑立传,从来不是共产党人的追求。但是,牟宜之带领干部群众修筑的一座大堤,连同他的名字至今矗立在沂蒙人民的心中。这就是位于山东沂南县砖埠镇的袁家口子大堤。

袁家口子大堤地处沂河、汶河交汇处,历史上多次因山洪暴发,泛滥成灾,致使下游30多个村庄深受其害。1941年4月,由沂蒙专署专员牟宜之倡导,沂临边联县民主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织民工奋战3个多月,开支国币1.5万余元,筑堤5039米。7月,袁家口子大堤落成,水患从此根除,立石碑以记其事。袁家口子大堤落成纪念碑通高3米,为六棱柱体,碑帽呈笋笠状,碑身碑帽组合,直立成一个劳苦大众之形象。石碑上有牟宜之题写的“民主堤”三个字,还有山东省战工主任黎玉题写的“民主战胜一切”。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著名的抗战老人范明枢这样评价:“上天下地,人位乎中。志士担当,乃有事功。”掷地有声的一句话,点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有何不同。

中国共产党不是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官”。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畏人民。1938年6月,毛泽东在与平民教育学会代表谈话时指出:“政治的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要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在沂蒙山区沂河、汶河两岸的老百姓看到的是,清朝时期这片区域的万余亩良田悉被淹没;民国时期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泽国;国民党来了河水依旧泛滥成灾;而刚刚成立两个月的沂蒙区专员公署即使正处于日军频繁的“扫荡”、国民党反复搞摩擦的三角斗争中,即使财政十分困难,却毅然带领群众修堤筑坝,根除水患。沂蒙老百姓在与历史的比较、与其他政党的比较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不是站在老百姓头上发号施令的“官”,这是一个能够为百姓修筑大堤的政党。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在沂蒙这片土地上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开始慢慢赢得了民心;而沂蒙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一旦形成,直觉追随也就逐渐变成了清醒的行动自觉。在大堤的修筑中,各级党员干部和民工一起上阵、协力奋战,哪怕只有简单的锤子、铁镐等原始工具,哪怕只能是肩扛手提,他们却能够拧成一股绳,投入建造大堤的洪流中去。正



如纪念碑碑文中记载:“在敌后战斗环境与春荒严重期间,而能克服困难,竣此巨工,实为我民主政权对民众利益关怀之切及民众有坚强组织与伟大力量之表现。”

中国共产党不是蹲在机关里的“官”。人民群众对一个政党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不仅要看他是怎么说的,更要看他是怎么做的。为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对不能出实招、求实效的官僚主义者提出严厉批评,甚至说:“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人同志喜欢它。”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从来不乏以行践言的典范。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在大生产运动中,跑到盐田和大家一起劳动;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铸的军马踩坏了老乡的西瓜,一定要照价赔偿;“庄户县长”王东年为救济灾民渡过饥荒,毅然卖掉祖林。1940年9月13日,山东省战工会在全省行政会议上明确指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要深入民众,不做“等因奉此”的文牍主义者和蹲在机关里的“官”。在这次会议之后,全省各抗日政权迅速得到发展。最重要的是,党在根据地制定的政策,绝非只是桌子上转来转去的一纸公文,更不是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而是对民众利益的切实关注,是行军不踏青苗、拴马不啃树皮、打铺不用青草、看戏不乱拆墙头、修操场不损庄稼等一件件亲民小事的落地、

落实。可以说,袁家口子大堤的修建,绝非偶然的一时的政策,而是我们党始终如一的方针,是救民于苦难的现实担当。

中国共产党不是贪污腐败的“官”。一个政权是廉洁还是腐败,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抗战时期,由于执法公正、惩处有力,抗日民主政府成为全国廉洁政治的典范,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形成强烈对比。正如毛泽东指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山东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之后,对人民群众痛恨的贪污问题尤其警醒,1940年11月,黎玉在全省行政会议上的闭幕词中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明显标志,就是廉洁化,要反对贪污、腐化、浪费,贪污一定要枪毙!”1940年12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的《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对贪污财物不设下限,不管贪污多少,都要惩治;而贪污五百元以上者就要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据袁家口子大堤落成纪念碑的碑文记载,大堤的修建“共需民工五万六千三百名,石工八千九百六十二名,用石灰八万七千五百十斤,费国币一万五千四百七十四元七角二分。”账目公开,刻于石碑之上;所需物资,

精确到斤;所费钱币,精准到分。看似较真的数字背后,是那一代共产党人超越利益羁绊、廉洁奉公的见证,更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共建家园的见证!

袁家口子大堤,深刻诠释了沂蒙精神产生之源。正是中国共产党不站在老百姓头上的为民情怀、不蹲在机关里的务实之举、不贪污腐败的清廉之风,最大程度地赢得了民心,人民才能够坚定跟党走。大堤建成之后,自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关爱拥护。在战争年代,每逢日军扫荡,群众便会自发地用柴草覆盖纪念碑。正如碑文中所讲:“自我民主政权树立以还,兴利除弊,不遗余力,对此攸关民生之举,奚能漠然置之?”在群众的心里,这座大堤绝不仅仅是一个民生实践,也是一项民主变革,是军民鱼水情深共同铸就的一座钢铁长城。

袁家口子大堤,生动映射了沂蒙精神发展之本。大堤凝聚着共产党人最大的初心,也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窗口。在此后的岁月里,从修筑大堤到导沭整沂,从民生凋敝到跨越发展,从舟车不通到物流之都,从抗击“非典”到打响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攻坚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这片土地上成功应对了各种艰难困苦和外部风险挑战,沂蒙人民也在热烈响应党组织号召中实现着自身的利益,改变着自身和蒙山沂水的面貌。“志士担当,乃有事功”体现了共产党人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价值追求。有了这样的价值追求,“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就水到渠成。同时,这也验证了一个真理:只有把人民冷暖放在心里、把责任担当扛在肩头、把修身律己融入灵魂,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和坚定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在人民。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今,沂蒙老区已经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从洪水肆虐到物阜民丰。在今天的繁华里,每个人的生活都因为坚定跟党走变得更好,这才是百年间最为深刻的变革。大堤、碑刻会随着时间的老去,唯有初心永驻,精神常青,真正的丰碑才能矗立在人民心里。

(作者单位:沂蒙干部学院)



朝夕相伴的法国梧桐

□ 卢大海

没有法国梧桐,就不大像南京。南京的中山路、北京西路、汉中门大街等城市主干道的两侧,以及很多景区和单位院内,都栽植有法国梧桐。同秦淮河、紫金山、夫子庙一样,法国梧桐也是南京人乡愁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传,19世纪70年代,一些法国人来到南京,有人在南京最早的新式小学——石鼓路小学,种下了南京第一棵法国梧桐。从此,来自遥远欧洲大陆、国内最早栽植于上海的树种,开启了与南京的不解之缘。六朝古都南京敞开怀抱接纳了它,数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接续栽植,成就了今天南京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栽下的法国梧桐,现如今树干一人合抱已比较困难,树冠隔街“牵手”,遮天蔽日连成一片。岁月变迁,四季轮回,日出日落,棵棵法国梧桐伫立在那里,融入南京人生活的日常,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点滴变化。

法国梧桐的学名为“悬铃木”,其实它既非法国原产,也非梧桐。它被人们誉为“行道树之王”,是优良的庭荫树和行道树,其最早由西班牙培育,后在英国和法国逐步种植开来。因叶子与梧桐有几分相似,又是由法国人最早将其引种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人们便习惯将它称为法国梧桐。法国梧桐的果实大小和核桃接近,通体浑圆,垂于细长的

果茎之上,如同一个个垂垂的小铃铛,学名因此得之。根据一个果茎之上果实多少,分为一球悬铃木、二球悬铃木、三球悬铃木,南京栽植较多的是二球悬铃木。从植物学专业的角度看,法国梧桐隶属蔷薇目悬铃木科,与真正的梧桐所属的锦葵目梧桐科风马不接。

我一直认为,法国梧桐的“悬铃木”学名,是富有天真童趣、浪漫柔情和诗情画意的。未见其树,仅闻其名,浮想便早已插上翅膀,飞向它那气势磅礴的片片浓绿,驰往那“悬铃”摇曳泛起的风情。炎炎夏日,是法国梧桐一年中最耀眼时刻,它像舍己为人的“君子”,用宽大浓密的树叶撑起绿荫,送来清爽,拂去骄阳的炙烤。细长果茎上挂着的碧绿果实,隐藏在绿叶间,清风吹过,左摇右摆,忽隐忽现,颇似随风舞动的风铃。六七月份,法国梧桐会褪去灰褐色的干皮,露出灰白又略显青绿的树皮,你能感觉到它在努力向上生长。萧瑟秋风起,树叶逐渐由绿色被漆

成淡黄,随风飘落的手掌大小的树叶,唤起人们“一叶知秋”的感伤。秋去冬来,法国梧桐把天空还给了大地,阳光透过稀疏的枝丫洒落下来,街道不再清冷,多了几分暖意。春日里,是法国梧桐淘气耍小性子的时候,球形果实渐次炸裂脱落,大风起,抖落漫天飞舞的“毛毛雨”,着实让人难受。每到这时候,南京人抱怨归抱怨,但也仅仅是口头上发发狠,风过“雨”停,一切的不舒服也就随风而去。

法国梧桐的寿命一般为150至180年,南京中山路和中山陵风景区陵园路两侧栽植的法国梧桐,树龄现已大约90岁,恰值壮年。树足足有五六层楼高,阔钟形巨幅树冠随着马路的延伸,打造出气势恢宏的绿色长廊,滞尘、降噪,让人们身居闹市,安享自然之美。南京现存那么多大几十年树龄的法国梧桐,要感谢孙中山先生和刘伯承元帅。孙中山尤爱法国梧桐,中华民国成立后,在南京广种法国梧桐。后来为了纪念缅怀

孙中山先生,人们又陆续种植了很多,最多的一年,在中山路等城市主干道就栽种了约2万棵。当时栽种的法国梧桐,主干之上一般都修剪留有三个支干,以喻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真正大规模种植法国梧桐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南京首任市长刘伯承对高大挺拔的法国梧桐十分钟爱,在他的推动下,仅在50年代初就栽种了几万株法国梧桐。

感恩法国梧桐岁岁年年的陪伴,上下班穿行于南京的北京西路之上,与道路两侧的法国梧桐每天相见,内心无比安然。有法国梧桐的日子,岁月是静好的;有法国梧桐的南京,城市是灵动的。



被誉为“醇儒”的曾巩,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而且是北宋文坛大家,长于散文,其文风“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成一家”,被后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为人、为文、从政皆有建树,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博览群书的习惯养成、家学渊源的耳濡目染、坎坷经历的不断磨练和良师益友的共同扶持息息相关。

博览群书获感悟。曾巩读书经历丰富,历经孩童时期的启蒙阶段、南轩躬耕陇亩的苦读阶段和史馆校勘任职期间的广读阶段。他在《学舍记》中回忆道:“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通过博览群书“广其学而坚其守”,广博的知识为他后来文学上的成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且培育了他的清正品质。后来在仕途不顺抑或是人生失意之时,他没有选择消沉和随波逐流,而是转向圣贤之书中去寻求理趣。读书使他在散文创作上更加成熟,他的创作经历了多个高峰期,特别是在第一个高峰期南轩耕读时期,耕作之余,他偕弟辈们结茅自休,力学不止,所学涉猎六艺百家、史籍笺疏、兵权历法、方言地志,给后世留下很多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墨地记》和《宜黄县志》是典型代表作。

家学渊源受熏陶。出生在世代书香家庭里的曾巩,受到的家庭濡染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塑造了耿介的品格。影响人物主要是其曾祖父曾致尧。《南丰县志》所记的一则传闻即可见一斑:“初,致尧尝宴见,太宗从容语及内帑充裕,甚自喜。时方忧旱,致尧即奏对曰:‘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为富也’。帝为之动容。”曾致尧这种貌似迂阔而实则耿介的性格,对曾巩影响很大。二是培养了重民的情怀。影响人物主要是其父曾易占。曾易占官阶不高,只做过几任知县,但却很关注民情,主张“治天下必先之以名教”。这个思想深深影响了曾巩。三是激扬了其著述的创作才华。曾氏是文学世家,其一、二、三世祖,皆长于著述,而且其伯父曾易简、叔父曾易持也都长于诗文,这些都为曾巩成为散文名家营造了良好的文学环境。

坎坷经历得锤炼。仕途道路上,曾巩经历了16年科举求仕生涯、8年京城校勘史馆仕涯、12年辗转多地的外任生涯,直到晚年才短暂的复京任职;个人生活中,他多次经历“落叶添薪之苦”和骨肉至亲的撒手离世,可谓是仕途多舛、家道坎壈。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见尽世情险恶之难测、饱尝生活艰辛之苦害,但他“嗟予计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颓”的雄心与抱负不曾有丝毫改变。在他外任期间,熙宁四年,被调往齐州任职。在齐州,他大力兴修水利、整治治安、开设学堂、贯彻新法,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从而获得了齐州百姓的拥戴。留下了在他离任时,老百姓绝桥闭门挽留,他不得不乘夜而去的佳话。

一代醇儒曾巩

□ 黄鹰西

良师益友共扶持。曾巩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良师益友的帮助与扶持。说到良师益友,不得不提到欧阳修和王安石。欧阳修并非只将曾巩视作最得意的门生,更引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经常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对其“不以众人待之”。嘉佑二年,欧阳修奉命知贡举,主持科试,曾巩及第。嘉佑五年,欧阳修举荐曾巩充任馆职,他非常重视曾巩的才能。而王安石和曾巩曾是挚友,他们被彼此的文采深深折服,后来虽因政见不同而疏远,但王安石给过曾巩以很大的帮助。庆历三年,曾巩参加科试落榜。南归时,受到一些讥讽和嘲笑。对于这些飞短流长,王安石写了《赠曾子固》《答段缝书》等诗文为之辩诬,“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这对处于困境中的曾巩无疑是相当有力的支持和声援。

